



梁启超
著



先秦政治思想史

堪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不朽经典

梁启超研究先秦思想史的代表作，探寻中国政治哲学之源。

古吴轩出版社

中国·苏州

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启超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秦政治思想史 / 梁启超著 . — 苏州 : 古吴轩出版社 ,
2017.5

(鸿儒国学讲堂)

ISBN 978-7-5546-0921-7

I . ①先… II . ①梁… III . ①政治思想史—中国—先秦时代 IV . ① D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8127 号

责任编辑: 蒋丽华

见习编辑: 薛 芳

装帧设计: 鸿儒文轩·书心瞬息

书 名: 先秦政治思想史

著 者: 梁启超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 215006

Http: //www.guwuxuancbs.com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 0512-65233679

传真: 0512-65220750

出 版 人: 钱经纬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40 1/16

印 张: 13.5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6-0921-7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序

启超治中国政治思想，盖在二十年前，于所为《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常作断片的发表，虽大致无以甚异于今日之所怀，然粗疏偏宕，恒所弗免。今春承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之招，讲先秦政治思想，四次而毕，略赅前绪而已；秋冬间，讲席移秣陵，为东南大学及法政专门讲此本，讲义且讲且编，起十月二十三日，迄十二月二十日，凡两阅月成，初题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分序论、前论、本论、后论之四部，其后论则自汉迄今也。中途婴小疾，医者谓心藏病初起，既有征矣，宜辍讲且省思虑，不则将增剧而难治。自念斯讲既已始业，终不能戛然遽止，使学子触望，卒弮勉成之，幸病尚不增，能将本论之部编讲完竣，其后论只得俟诸异日矣。因所讲仍至先秦而止，故改题今名，启超讲述斯稿之两月间，以余力从欧阳竟无先生学大乘法相宗之教理；又值德人杜里舒博士同在金陵讲学，而张君励董其译事，因与君励同居，日夕上下其议论。兹二事者，皆足以牖吾之灵而坚其所以自信，还治所业，乃益感叹吾先哲之教之所以极高明而道中庸者，其气象为不可及也。书成后，徐志摩拟译为英文，刘文岛及其夫人廖世劭女士拟译为法文，倘足以药现代时弊于万一，斯则启超所以报先哲之恩我也已。

民国十一年（1922）十二月二十八日
梁启超自序于南京成贤学舍

目 录

第一篇 序 论

第一章 本问题之价值·····	2
第二章 问题之内容及资料·····	7
第三章 研究法及本书研究之范围·····	10

第二篇 前 论

第一章 时代背景及研究资料·····	14
第二章 天道的思想·····	18
第三章 民本的思想·····	27
第四章 政治与伦理之结合·····	34
第五章 封建及其所生结果·····	38
第六章 阶级制度兴替状况·····	41
第七章 法律之起原及观念·····	44
第八章 经济状况之部分的推想·····	49

第三篇 本 论

第一章	时代背景及思潮渊源	56
第二章	政治思想四大潮流及研究资料	60
第三章	儒家思想(其一)	64
第四章	儒家思想(其二)	70
第五章	儒家思想(其三)	74
第六章	儒家思想(其四)(孟子)	80
第七章	儒家思想(其五)(荀子)	87
第八章	道家思想(其一)	94
第九章	道家思想(其二)	104
第十章	墨家思想(其一)	110
第十一章	墨家思想(其二)	114
第十二章	墨家思想(其三)	121
第十三章	法家思想(其一)	127
第十四章	法家思想(其二)	131
第十五章	法家思想(其三)	137
第十六章	法家思想(其四)	142
第十七章	统一运动	148
第十八章	寝兵运动	151
第十九章	教育问题	154
第二十章	生计问题	160
第二十一章	乡治问题	169
第二十二章	民权问题	172
第二十三章	结 论	177

前 言

第一篇 序 论

第一章 本问题之价值

人类全体文化，从初发育之日起截至西历十五六世纪以前，我国所产者，视全世界之任何部分，皆无逊色。虽然，我国文化发展之途径，与世界任何部分，皆殊其趋。故如希伯来人、印度人之超现世之热烈宗教观念，我无有也；如希腊人、日耳曼人之瞑想的形而上学，我虽有之而不昌；如近代欧洲之纯客观的科学，我益微不足道。然则中国在全人类文化史中尚能占一位置耶？曰：能。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坐是之故，吾国人对于此方面诸问题之解答，往往有独到之处，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吾国人参列世界文化博览会之出品恃此。

人生哲学，不在本讲义范中，且置勿论，专言政治哲学。我国自春秋战国以还，学术勃兴，而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其政治思想有大特色三：曰世界主义，曰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曰社会主义。此三种主义之内容，与现代欧美人所倡导者为同为异，孰优孰劣，此属别问题。要之，此三种主义，为我国人夙所信仰。无论何时代、何派别之学者，其论旨皆建设于此基础之上。此三种主义，虽不敢谓为我国人所单独发明，然而最少亦必为率先发明者之一。此吾所不惮昌言也。

欧洲自十四五世纪以来，国家主义，萌茁发展，直至今次世界大战前后，遂臻全盛。彼所谓国家主义者何物耶？欧洲国家，以古代的市府及中世的堡聚为其雏型。一切政治论，皆孕育于此种市府式或堡聚式的组织之下。此种组织，以向内团结、向外对抗为根本精神。其极也，遂至以仇嫉

外人为奖励爱国冲动之唯一手段。国家主义之苗，常利用人类交相妒恶之感情以灌溉之，而日趋蕃硕。故愈发达而现代社会机陞不安之象乃愈著。（罗素所著《爱国功过》一书，言“英国人惯用仇嫉外国的卑劣手段，以奖励其国民爱国心。最初仇西班牙人，继则仇法国人，继则仇德国人，今后又不知当仇谁氏”。此言深可味。）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乎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政治之为物，绝不认为专为全人类中某一区域、某一部分人之利益而存在。其向外对抗之观念甚微薄，故向内之特别团结，亦不甚感其必要。就此点论，谓中国人不好组织国家也可，谓其不能组织国家也亦可。（其所谓天下者，是否即天下且勿论，要之，其着眼恒在当时意识所及之全人类。）无论为不好或不能，要之，国家主义与吾人夙不相习，则甚章章也。此种“反国家主义”或“超国家主义”的政治论既深入人心，政治实况当然受其影响。以二千年来历史校之，得失盖参半。常被异族蹂躏，是其失也；蹂躏我者非久便同化，是其得也。最后总决算，所得优足偿所失而有余。盖其结果常增加“中国人”之组成分子，而其所谓“天下”之内容，日益扩大也。欧洲迄今大小数十国，而我国久已成为一体，盖此之由。虽然，此在过去为然耳，降及近世，而怀抱此种观念之中国人，遂一败涂地。盖吾人与世界全人类相接触，不过在最近百数十年间，而此百数十年，乃正国家主义当阳称尊之唯一时代。吾人逆潮以泳，几灭顶焉。吾人当创巨痛深之余，曷尝不窃窃致怨于先民之诒我戚。然而平陂往复，理有固然。自今以往，凡畴昔当阳称尊之学说，皆待一一鞠讯之后而新赋予以评价。此千年间潦倒沉沦之超国家主义——即平天下主义、世界主义、非向外妒恶对抗主义——在全人类文化中应占何等位置，正未易言。

平等与自由，为近世欧洲政论界最有价值之两大产物。中国在数千年专制政体之下，宜若与此两义者绝相远。然而按诸实际，殊不尔尔，除却元首一人以外，一切人在法律之下皆应平等。公权、私权皆为无差别的享用，乃至并元首地位，亦不认为先天特权，而常以人民所归向、所安习为条件。此种理想，吾先民二千年前，夙所倡导，久已深入人心，公认为天经地义；事实上确亦日日向此大理想进行，演成政治原则，莫之敢犯。其最显著者，则欧美贵族、平民、奴隶等阶级制度，直至近百年来始次第扑灭；其余烬之一部分，迄今犹在。我国则此种秕制，已成二千年僵石。欧

人所谓“人权”，全由阶级斗争产来。其得之也艰，故其爱护之也力。我国则反是，斯固然矣。然必有阶级然后有斗争之主体。在久无阶级之我国，兹事自不能成问题。且以学理衡之，吾侪亦不能认阶级斗争为性质上可崇敬之事业。若果尔者，一切阶级灭尽之后，人类政治岂不日陷于堕落耶？我国历史上未闻有此等惨酷之斗争，而已得有相当的人权，纵不必自豪，亦未足云辱也。所以能尔者，则以人类平等观念，久已成为公共信条，虽有强者，莫敢屡撻也。

自由与干涉对待，政治上干涉主义之利病，在我国先秦时代，实为学界争论最剧之问题。结果不干涉主义，殆占全胜。此主义以不可抗的权威，常临乎历代君相之上。故秦汉以降，我国一般人民所享自由权，比诸法国大革命以前之欧洲人，殆远过之。事实具在，不可诬也。其间昏主淫威，墨吏馥法，致自由失所保障者，史固不绝书。然吏之毒民，非法律所许，民本有控诉之余地。至对于暴君，则自昔圣贤，皆认革命为人民正当权利，在学理上未尝少为假借也。我国民惟数千年生活于此种比较的自由空气之中，故虽在乱离时，而其个性之自动的发展，尚不致大受戕贼。民族所以能永存而向上，盖此之由。

美林肯之言政治也，标三介词以櫟括之曰：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译言政为民政，政以为民，政由民出也。我国学说，于 of、for 之义，盖详哉言之，独于 by 义，则概乎未之有闻。申言之，则国为人民公共之国，为人民共同利益故乃有政治。此二者者，我先民见之甚明，信之甚笃。惟一切政治当由人民施行，则我先民非惟未尝研究其方法，抑似并未承认此理论。夫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力乃在人民以外。此种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为效几何？我国政治论之最大缺点，毋乃在是？虽然，所谓“政由民出”者，不难于其理论也，而难于其方法。希腊诸市之全民会议，遂得谓为真 by the people 耶？近世诸国通行之代表制、多数取决制，乃至最近试验之苏维埃制，又得谓为真 by the people 耶？皆不容无疑。然则实现 by the people 主义之方法，虽在欧美今日，犹不能作圆满解答，况我国过去之国情——因地理及其他关系所产生之社会组织——多不适于此类方法之试验。既不能得有可恃之方法，则不敢轻为理论的主张，亦固其所。要之，我国有力之政治理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

灭。欧美人睹中华民国猝然成立，辄疑为无源之水，非知言也。

文化演进较深之国，政治问题，必以国民生计为中心，此通义也。我国盖自春秋以前，已注重此点。“既富方谷”、“资富能训”诸义，群经既所屡言，后此诸家政论，罔不致谨于是。而其最大特色，则我国之生计学说，常以分配论为首位，而生产论乃在次位也。欧洲所谓社会主义者，其唱导在近百余年间耳。我国则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其所论列，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在此主义之下，而实行方法大相径庭，亦与现代社会之派别多歧者略相似。汉唐以降之实际的政治，其为人所称道者，又大抵皆含有社会政策之精神，而常以裁抑豪强兼并为职志者也。故全国人在比较的平等组织及条件之下以遂其生计之发展，世界古今诸国中，盖罕能与我并者。此虽半由环境所构成，抑亦学说之入人深也。（中国未受工业革命之影响，故分配以惰力而保平均，似不能持以与今代欧美比较；然中国百年前之经济组织，与欧洲百年前亦迥不同。我则一向皆常能保均富而抑兼并，此根本特色也。）

窃尝论之，中国文明，产生于大平原。其民族器度伟大，有广纳众流之概。故极平实与极诡异之学说，同时并起，能并育而不相害。其人又极富于弹性，许多表面上不相容之理论及制度，能巧于运用，调和焉以冶诸一炉。此种国民所产之思想及其思想所陶铸而成之国民意识，无论其长短得失如何，要之在全人类文化中，自有其不朽之位置，可断言也。夫绝对的真理之有无，学者久已疑之，理论上且有然。若夫理论之演为制度者，其是非盖益幻曠而不易究诘。（中国国民性之短处亦自有之，如好调和以致不彻底，即其一也。此非本论范围，故不多及。）欧洲近一二百年，政治学说、生计学说之标新领异，几使人应接不暇。种种学说，亦泰半已经次第实现以成制度。然每一主义之昌，未尝不有极大之流弊踵乎其后，至今日则其人深陷于怀疑恼闷之渊。举凡前此所安习之制度，悉根本摇动。欲舍其旧而新是谋，则皇皇然若求亡子而未得也。我先民所治我之思想，虽或未成熟，或久中断，搜剔而磨洗之，又安见不龟手之药终无益于人国也。由此言之，本问题之价值可以见矣。

平心论之，价值之为物，本非绝对的、不变的。吾侪殊不必妄自尊大，谓吾所有者必有以愈于人，更不宜讳疾忌医，掩护其所短以自窒进步。但尤有一义当知者，本国人对于本国政治思想，不惟其优良者有研究价值，即其窳劣者亦有研究价值。盖现代社会，本由多世遗传共业所构

成。（“业”字为佛教术语，个人遗传性谓之别业，社会遗传性谓之共业。）此种共业之集积完成，半缘制度，半缘思想，而思想又为制度之源泉。过去思想，常以历史的无上权威无形中支配现代人，以形成所谓国民意识者。政治及其他一切设施，非通过国民意识之一关，断不能有效。质言之，非民众积极的要求或消极的承诺之政治，则不能一日存在。（积极要求者，以国民意识积极的作用创造一种新组织也，例如法国之“人权宣言”为十九世纪民权国家成立之总发动机。消极承诺者，以国民意识消极的作用，维持一种旧组织者也，例如日本今尚戴万世一系之天皇，中国人民默许藩镇割据。）近二十年来，我国人汲汲于移植欧洲政治制度，一制度不效，又顾而之他，若立宪，若共和，若联邦，若苏维埃……凡人所曾行者，几欲一一取而试验之。然而名实相缪，治丝愈棼。盖制度不植基于国民意识之上，譬犹掇邻圃之繁花，施吾家之老干，其不能荣育宜也。最近穷而思返，先觉者始揭改造思想之旗以相号召。虽然，改造云者，不惟其破坏也，而惟其建设。欲革去一旧思想，必须有一新思想焉足饜人心者以代之，否则全社会陷于怀疑与虚无，结果仍让彼有传统的惰力之旧思想占优势耳。而新思想建设之大业——据吾所确信者，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信如是也，则我国过去政治思想，虽其中一部分对于世界无甚价值者，就吾国人立脚点言之，其价值不可蔑视明矣。

第二章 问题之内容及资料

政治思想之内容，从所表现的对象观察，可分为二类：一曰纯理，二曰应用。纯理者，从理论上悬一至善之鹄，研究国家当用何种组织，施政当采何种方针等。应用者，从实际上校其效率，研究某种组织、某种方针等如何始能实现。此两者虽有区别，然常为连锁的关系。纯理必藉应用而始圆满，应用必以纯理为其基据。

从能表现之主格观察，亦可分为二类：一曰个人的思想，二曰时代的思想。个人的思想，为大学者或大政治家脑力所产物，其性质为有意识的创造；时代的思想，由遗传共业及社会现行习俗制度混织而成，其性质为无意识的演进。两者亦常有交光的关系，个人能开拓时代，时代亦孕育个人。

吾侪欲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其资料当求诸何处耶？以吾所见，区为四类：

第一类，学者之著述及言论。此为个人创造力之完全表现，例如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尹文、孟子、荀卿、韩非、贾谊、董仲舒、仲长统、桓宽、司马迁、杜佑、司马光、郑樵、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戴震、谭嗣同等，皆有著述传后。吾侪将其著述爬梳整理，可以察其思想之脉络焉。此外或无著述、或虽有而已佚者，则从别人所征引彼之言论以窥其思想之一斑。此惟先秦时代为较多，例如邓析思想，见于《吕氏春秋》；许行思想，见于《孟子》；惠施思想，见于《庄子》；宋钘思想，见于《孟子》、《荀子》之类是也。

第二类，政治家活动之遗迹。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不同，哲学思想为学者所独有，其发表之形式专恃著述；政治思想什九与实际问题的接触，

一有机会，则不惟坐而言，直将起而行。故凡属有主张有设施之政治家，例如周公、管仲、子产、孔子、商鞅、李斯、汉高祖、汉武帝、王莽、诸葛亮、崔浩、苏绰、唐太宗、刘晏、陆贽、王安石、明太祖、张居正、清圣祖、曾国藩之流，无论其人为贤为不肖，其事业为成为败，要之其关于政治上之设施，皆其思想之现于实者也。故此等人之传记，实斯学主要资料之一种。

第三类，法典及其他制度。政治思想之实现，恒结晶以变为成文之法典及其他单行制度，例如《周官》、《法经》、《汉律》、《汉官》、《唐律》、《唐开元礼》、《元典章》、《明会典》、《清律例》、《清会典》，乃至如《通典》、《文献通考》等类之政书，与夫历代诏令奏议，凡此类法制之书，虽大半递相沿袭，而其间有所损益，恒必与其时代之要求相应，此即彼时代政治思想之表现也。至于立法时赞成、反对之意见表于言论者，尤为时代思想之徽帜，自无待言。

第四类，历史及其他著述之可以证察时代背景及时代意识者。凡思想皆应时代之要求而发生，不察其过去及当时之社会状况，则无以见思想之来源。凡一思想之传播，影响必及于社全，不察其后此之社会状况，则无以定思想之评价。故欲治政治思想史，必须对于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风俗史等有相当之准备，然后其研究不至歧误。又各时代中一般人（指学者及政治家以外之人）之言论，往往有单辞片语，尤为当时多数人意识之代表，非博观而约取之，不足以觐时代思想之全内容。此种资料，既无完善之成书可供采择，则亦惟泛求诸群籍而已。

右四类，前二类为研究个人思想之资料，后二类为研究时代思想之资料。其实两者有交光的关系既如前述，则此种界限，殊无取细分也。以吾所见，中国政治思想史现存之资料，可谓极丰富，独惜散在群籍，非费极大之劳力，不能搜集完备，且非有锐敏的观察力，时复交臂失之。此则凡治国故者所共感之苦痛，不徒本问题为然耳。

资料审择，又为治国故者一种困难之业。因古来伪书甚多，若不细加甄别，必致滥引而失真。例如以《内经》为黄帝思想，以《阴符》为太公思想，以《周礼》为周公思想，以《家语》、《孔丛子》所记为孔子思想，以《列子》、《关尹子》、《鬼谷子》等书各为其本人思想，乃至以《伪古文尚书》为三代时思想，杂讖纬诸书为邃古时思想，如是必至时代背景与思想系统完全混乱，而史之作用全失。

不惟伪书而已，即真书中所记古事古言，亦当分别观之。盖古代著述家，每将其理想托诸古人以自重。孟子称“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岂惟许行，实亦可谓有为尧舜之言者孔丘、孟轲；有为大禹之言者墨翟；有为黄帝之言者庄周也。（《韩非子·显学篇》云：“孔子、墨子同道尧舜，而趋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可复生，谁与辩儒墨之诚乎？”此语最能道出先秦诸子托古之真相。）故虽以此等大哲之著书确实可信者，其所述先代之事迹及言论，大半只能认为著书者之思想，而不能尽认为所指述之人之思想。又不惟专家著述为然，即诸经诸史中资料，亦当加审慎。孟子论治《诗》也，谓当“不以辞害意”；其论治《书》也，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盖史迹由后人追述，如水经沙滤，必变其质。重以文章家善为恢诡诎荡之辞，失真愈甚。吾侪既不能吐弃此等书以孤求史迹，而其所记载又玉石混淆，则惟有参征他种资料，略规定各时代背景之标准，其不大缪于此标准者则信之而已。此则治一般史之通例，其方法非本书所能殚述也。

辨别伪书，凡以求时代之正确而已，不能因其伪而径行抛弃。例如谓《管子》为管仲作，《商君书》为商鞅作，则诚伪也，然当作战国末法家言读之，则为绝好资料。谓《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书，则诚伪也，然其中或有一小部分为西周遗制，其大部分亦足表现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之交之时代背景，则固可宝也。又如《内经》决非黄帝时代书，自无待言，然其书实战国末阴阳家言所荟萃，阴阳家如邹衍之徒著述已佚，此书即其绝好之代表品也。《列子》非列御寇作而为晋人伪撰，亦略有定评，然晋人学说，传今无几，即以此书规当时时代意识之一斑，计亦良得也。

尤有一类资料决当拣（揅）弃者。汉代策问郡国所贡士，已开奖借空言之渐。唐宋以还，斯风弥扇，如韩愈、杜牧及苏洵、轼、辙父子兄弟之徒，多以好为肤廓之政论，滥博盛名。明清末流，帖括播毒，谈政本必“危微精一”，论政制必“封建井田”，尘土羹饭，屡嚼而秽不惭；优孟衣冠，久假而归无日。凡兹谰言，概宜芟汰。要之，学者之学说，当以有无创造力为价值标准；政治家之绩业，当以有无责任心为价值标准。合此标准，可以厕诸思想之林，否则毋愿我为也。

第三章 研究法及本书研究之范围

研究法有三种：第一，问题的研究法。先将所欲研究之事项划出范围，拟定若干题目，每个题目，皆上下古今以观其变迁。其总问题，例如“国家起源”、“政府组织”等；其分问题，例如“土地宜公有抑私有”、“封建为利为弊”、“刑罚宜取惩报主义抑取感化主义”等。研究某时代对于本问题之趋势何如，某学者对于本问题之态度何如，以类相次，一题毕乃及他题。此法长处，能令吾侪对于各种重要问题，得有致密正确的知识，而且最适于实地应用。其短处，在时代隔断，不易看出思想变化之总因间因，且各问题相互之关系，亦不明了。

第二，时代的研究法。此法按时代先后顺序研究，例如：先三代，次春秋，次战国，次秦汉等。在同一时代中，又以思想家出生之早晚为次，例如春秋战国间，先老子，次孔子，次墨子，次商君、庄子、孟子、荀十、韩非等。此法长处，能使思想进化之迹历历明白，又可以将各时代之背景——即政治实况及社会实况——委细说明，以观思想发生之动机。其短处，则同一时代中或资料太多，对于各问题难于详细叙述，若勉强叙述之，则易时所述，与前犯复，令读者生厌；又一派之学说先辈与后辈年代隔离，（例如孔子与孟子、孟子与荀卿。）令读者迷其脉络所在。

第三，宗派的研究法。此法将各种思想抽出其特色，分为若干派。例如儒家思想，自孔子起，继以七十子后学者，继以孟子、荀卿、董仲舒等；法家思想，自管仲、子产起，次至商鞅、韩非……乃至末流之晁错、诸葛亮等，以类论次。此法长处，对于一学派之思想渊源——其互相发明递为蜕变及大派中所含支派应时分化之迹，易于说明；各派对于具体问题所主张，亦易于比较。其短处，在时代隔断。例如先述儒家，次述道家，

则与孔子时代相次之老子，须于荀卿、董仲舒……诸人叙毕乃能论及，对于思想进化次第，难以说明；又各派末流相互影响甚多，归类难以正确；又数大派之外，其有独立思想而势力较微者，容易漏略。

以上三法，各有短长，好学深思之士，任取一法为研究标准，皆可以成一有价值之名著也。

政治思想与其他思想之关系，兹更当一言。第一，凡伟大之学者必有其哲学上根本观念，而推演之以论政治，故欲研究先秦各派之政治思想，最少亦须对于彼之全体哲学，知其梗概。第二，政治与经济，原有密切不可离之关系，吾国夙崇“政在养民”之训，政论及政策，尤集中于人民生计。故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实应融洽一炉以从事研究。第三，政治思想之深入国民意识中者，恒结晶为法律及制度，而政治之活力，常使晶体的法制生动摇。故两者相互之机括，又治史学者所最宜注意也。

复次，论研究者所当持之态度。科学所以成立，全恃客观的研究精神。社会科学比诸自然科学完成较晚者，因社会事项，最易惹起吾人主观的爱憎，一为情感所蔽，非惟批评远于正鹄，且并资料之取舍亦减其确实性也。一切社会科学皆然。而政治上理论，出入主奴之见尤甚。中国唐宋以后学者，所谓“正学异端”、“纯王杂霸”、“君子小人”之论嚣然，而斯学愈不可复理。吾侪既以治史为业，宜常保持极冷静的头脑，专务忠实介绍古人思想之真相，而不以丝毫自己之好恶夹杂其间，批评愈少愈妙，必不得已而用，亦仅采引申说明的态度，庶乎有当也。此其一。

国故之学，曷为直至今日乃渐复活耶？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加以国民自慢性为人类所不能免，艳他人之所有，必欲吾亦有之然后为快。于是尧舜禅让，即是共和；管子轨里连乡，便为自治；类此之论，人尽乐闻。平心论之，以今语释古籍，俾人易晓，此法太史公引《尚书》已用之，原不足为病。又人性本不甚相远，他人所能发明者，安在吾必不能，触类比量，固亦不失为一良法。虽然，吾侪慎勿忘格林威尔之格言“画我须是我”。吾侪如忠于史者，则断不容以己意丝毫增减古人之妍丑，尤不容以名实不相副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此在百学皆然，而在政治思想